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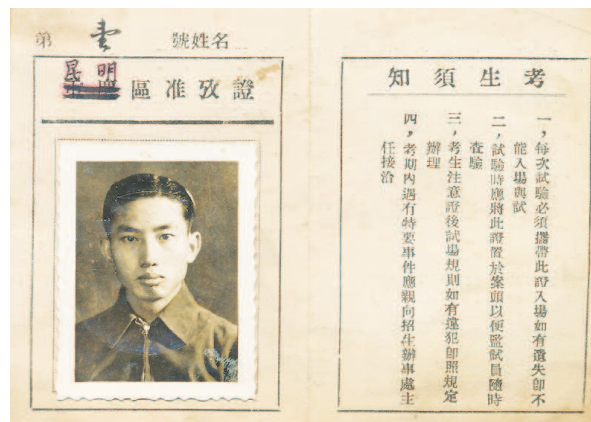
◀ (上接2版)

的徐锡台先生当时对我说,美术史研究在国外发展很好,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好的前景,让我好好跟刘先生学。他还说刘先生做的学问别人做不了。就是说,当时还是有少数学者看到了刘先生研究的价值所在。

于学术界的主流而言,刘先生做的是一个分支,而且这个分支在当时是刚刚冒出嫩芽。大多数人肯定是被主流拽着往前走。所以现在回头来看先生走过的路,他当时确实是挺尴尬的,摆脱不了行业内的偏见。

郑岩:我上世纪80年代末刚毕业时,听到有些前辈的评价,说刘先生是个“杂家”。这是个贬义词。那个时候考古学是高度专业化的,排他的,“杂家”怎么行?

刘先生的研究面很广,他对古国史、神话、民俗、农业史、畜牧史等等都很有研究,但他有两大块是用力最深的。第一是美术史,还有一个就是山东本土的考古学。具体来说,是致力于山东地区以史前为中心的田野考古,他对山东早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设是有贡献的。刘先生可以说在山东工作了一辈子,后来也担任过山东考古学会的副理事长。那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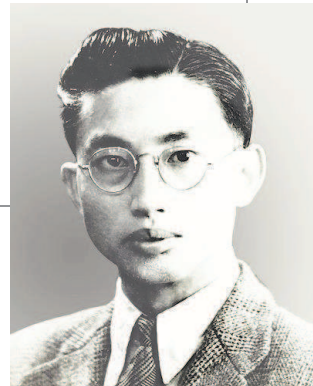
▲刘敦愿报考国立艺专时的准考证



▲民国时期各地的扶轮学校,是铁道部所办子弟学校,校风开明。



▲1939年,刘敦愿入读国立艺专西画科。他一直有拿旧书或杂志作剪贴本的习惯,信封、报章、证件、票据乃至商标,都是他的剪藏对象。



人,是山东考古的前辈,虽然他们不是标准的田野考古学家,但是为新中国山东考古的起步做了很多工作。

方辉:刘先生这一代人和

他们的前辈,像王献唐先生这一辈不一样。王献唐先生是传统的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过渡时期的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他做过省图书馆的馆长,30多岁的时候就做了很多抢救性的工作。刘先生到山东

以后,与他的来往很多,受王先生的影响很大。

当时并没有考古学专业,大多都是从中研院史语所殷墟考古队里面培养出来的。与王献唐那一代人不同,刘先生虽然也没有受过科班的考古学训

练,但他对此是很渴望的。于是,在建国初期烧沟汉墓发掘的时候,刘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北大合开培训班的成员参加了培训发掘。他当时是很兴奋的。通过培训,他了解了田野考古的基础知识,回头在山东也做了很多考古调查,参与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址,像胶县三里河等,当然还有两城镇这样已知的遗址他也去进行复查。我们看他那个时候写的几篇调查报告,不管是文字还是线图,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都是非常专业的。可以说,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具体领导考古发掘,但他已经是一个很标准的考古学家。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山大考古专业的创建。实际上,刘先生在“文革”前,每次和夏鼐先生见面,谈的都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建设的事。以前人们都说他是山东大学考古学科的奠基人,只是从理论上推测的,但是我们看《夏鼐日记》里,他俩在山东和北京为数不多的见面,每一次夏先生记的都是山东刘敦愿来谈山大考古专业建设事。

那时候山大历史系也刚刚从中文系独立出来,刘先生心里清楚创办专业是很难的,但他一方面做田野工作,一方面从历史系学生中培养人才,他

(下转4版) ▶

刘敦愿传略

刘敦愿,字子舒,1918年6月24日生于湖北汉阳。其曾祖父刘传莹,字椒云,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经学家,官至国子监学正,于《清史稿》有传。其父刘人劭(字少淮)是一位铁路职员,曾参加同盟会。

刘敦愿1932年毕业于郑州扶轮小学,1938年毕业于郑州扶轮中学。1939年,他在昆明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科。该校在抗日期间由北平与杭州两所艺专合并而成。刘敦愿随留法归国的秦宣夫(1906—1998)学习素描,受其影响,开始从古代艺术的角度接触到西方考古学的知识。不久,刘敦愿认为自己的秉赋更适合学术研究,便逐渐转向对美术史的学习。由于有着西画的背景,他最早的兴趣集中在西方美术史。但战时外来的资料颇不易得,加之当时艺专所在的四川巴县(今重庆江主城区)可以见到一些汉代画像砖等古代文物,他便转向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

为补充历史学知识,刘敦愿定期从国立艺专所在的巴县磐溪过嘉陵江到沙坪坝,在那里旁听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山(1901—1952)讲授的“商周史”与“史学名著选读”等课,风雨无阻,颇得了丁山嘉许。丁山认为先秦典籍是中国文

化的源头,刘敦愿遵其师命,花费大量时间,刻苦研读先秦文献,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敦愿1944年于国立艺专毕业后,经史学家蒙文通(1894—1968)帮助,进入四川省立图书馆工作,期间还曾短期担任过小学教员。1945年,他在迁于成都的齐鲁大学旁听了考古学家吴金鼎(1901—1948)讲授的“田野考古学”。1947年,经丁山推荐,他受聘于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讲授“历史文选”等课程,同时协助丁山的研究工作。

1953年5月,刘敦愿从山东大学中文系转入历史系,同年8月,进入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随后参加洛阳烧沟汉墓的发掘,接受较为系统的田野考古训练。刘敦愿对于田野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他先后调查山东日照、五莲、即墨、临沂、胶县等地多处古代遗址,并及时发表了相关调查报告。这一时期,他还撰写了

多篇关于山东龙山文化研究的论文,对于建立山东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有重要贡献。

“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刘敦愿家庭受到严重冲击,被迫中断研究工作,但他仍利用晚间阅读书籍,积累资料,为后来的研究工作作准备。从1950年代起,刘敦愿就积极谋划和筹备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1972年春,该专业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设立后,刘敦愿出任教研室主任,他为该专业的创立和教学工作的开展,耗费了大量心力,先后组织和参与山东泗水尹家城、日照东海峪、临淄齐故城等遗址的发掘。他不以个人学术长短限定学科的发展方向,始终注重田野调查和发掘,使得该校考古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稳步提高。

“文革”结束后,刘敦愿更加勤奋地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1979年,他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980年代,刘敦愿的研究进入高峰时段,发表了大量论文。这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中

国太平洋史学会理事、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山东古国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农史学会顾问、山东历史学会和山东博物馆学会顾问等职。除了美术考古、山东早期考古和古代史的研究外,他积极参与和倡导工艺美术、农业考古、民俗学与民间艺术等相关方面的研究。

1997年1月15日晨,刘敦愿因肺心病抢救无效,逝世于济南,终年79岁。遵照其遗嘱,其所有藏书与资料捐赠山东大学。

刘敦愿生前勤于笔耕,研究领域涵盖古代美术、史前与商周考古、山东古国史、古代神话与民俗、古代农业和畜牧业史、科技史、古籍整理等诸多领域,其中尤以对中国古代美术用力最深,所论涉及史前陶器艺术、商周青铜艺术、东周与汉代绘画,以及古代艺术与民间艺术的关系等问题。1994年,刘敦愿自选集《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在台北出版,2007年出版简体字版。2012年出版的《刘敦愿文集》收录论文115篇,可以反映其研究的基本面貌。他在晚年基本完成的古籍整理项目《齐乘校释》,由其学生补充完善,于2012年出版。

(鲁所瞻)